

鲁迅与 中外文化

鲁迅与中外文化

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编

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苏海门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3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43-0469-5

I·26

定价：2.90 元

责任编辑

王许林

目 录

学习、研究鲁迅 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 (代序)

.....孙家正 (1)

鲁迅小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学影响.....吴奔星 (8)

鲁迅文学观念的更新与中外文化影响.....包忠文 (26)

“庄子与鲁迅”新议

——兼与王瑶、夏传才同志商榷.....甘竞存 (37)

鲁迅、赫胥黎伦理观比较研究.....刘福勤 (54)

鲁迅的伦理观与中外文化.....顾 农 (81)

鲁迅关于建设新文化体系的构想及其在近代思想史

上的地位.....徐允明 (92)

论鲁迅“从文”与近、现代文艺思潮之关系.....王学钧 (116)

鲁迅的语言文化观.....朱晓进 江锡铨 (129)

鲁迅的戏剧理论初探.....倪 斌 顾文勋 (147)

鲁迅个性与鲁迅小说的喜剧艺术.....姜 建 (158)

随机应变 翻新出奇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和体系初探.....许 霖 (172)

论《呐喊》《彷徨》的景物描写.....茅宗祥 (188)

《过客》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闵抗生 (203)

《野草》与厨川白村.....王吉鹏 (221)

《补天》与弗洛伊德学说·····	周成平(232)
从文化角度开拓和深化鲁迅研究	
——江苏省“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述评···	苏鲁(240)
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	李 志(251)
鲁迅和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反“左”	
的历史功绩·····	王 湛(269)
从与朱安的悲剧婚姻看鲁迅的思想演变·····	周 棉(285)
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	程中原(298)



学习、研究鲁迅 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江苏省“鲁迅与中外文化”
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代序）

孙家正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伟人。在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正在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化遗产，科学地分析和总结鲁迅的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鲁迅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鲁迅逝世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而光辉的道路。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用这些伟大的成就告慰鲁迅先生的时候，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表层的物质文化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而且整个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文化素质，同正在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远远不相适应。鲁迅所批评的精神痼疾和其他有碍民族发展的东西，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鲁迅所致力的人的精神改造、民族改造、社会改造和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仍然亟待于我们为之努力奋斗。尽管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充满了信心。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的决议》精辟地指出：“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于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相信，遵循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这个伟大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新时期的经济、政治相协调、相配套。精神文化的革新必须渗透于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之中，不然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也很难迅速进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项庞大的全新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作多方面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而且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新文化的革命传统。因而，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学习、研究鲁迅，就成为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

向鲁迅学什么？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特别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赞美鲁迅那种“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赞美鲁迅“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严于律己的精神等等。瞿秋白同志也曾把鲁迅精神归纳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和“反虚伪的精神”。鲁迅这些可贵的革命精神，对于推动革命斗争和历史进步，曾产生了巨大作用，是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加以发扬的。今天，我

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如何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研究鲁迅、学习鲁迅，对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道路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从这位无产阶级新文化奠基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示，日益显示出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鲁迅的一生勇于探索，善于发现和研究新事物，不断地获取新知，具有坚毅地追求真理的特点。他从挣脱封建文化的旧套，到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奠基人；从主张进化论，进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历了艰难求索的过程。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社会、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把马克思主义融化、渗透于自己的生活、作品、理论和实践，从而在古今文化转折、中西文化交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伟大时代，使自己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前面，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鲁迅风格，形成了以此为特征的独特的文化道路和文化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不以为可以“止于至善”而使思想凝固和僵化，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继续求索，并且继续保持和增进自己在吸取其他多方面文化滋养基础上形成的特色。这就使他最终形成的文化思想，成为“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式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整体事业一样，也是一个艰难求索的过程，我们将能从鲁迅道路的研究中汲取智慧、勇气和力量。

第二，鲁迅是伟大的社会改革思想家，他留下了有关改革的丰富的思想成果。他既是高瞻远瞩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既是冷静深刻的社会观察家，又是热诚进取、脚踏实地地致力于改革家。他向往“无阶级社会”，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数十年中“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同时，更注重“现在”。他说，人们谈过去，谈遥远的将来，都被“现在”这个题目考了个“白卷”，开不出有效的“药方”。

他要解答这一难题，开的“药方”就是社会改革。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改革在当时的第一步是“革命”。他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但是，他清醒地看到当时“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都想来堆在道路上。”他看到了反动统治的黑暗，也痛切地感到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民体质和精神的“硬化”。鉴此，他注重民族自剖，分析其历史和现状，包括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着力于全面认识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的小说都充溢着反封建传统的精神，他大声疾呼，只要是阻碍“革新”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从多方面揭示“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挖掘民族传统的精华，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还对改革的规律、途径、动力等进行深入探寻。他说：“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再前进，则必须靠大众，必须“深入民众的大层中”。怎样改革呢？他说：“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大抵行不通”，“有志于改革者”必须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对现存的制度、风俗习惯等要“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他还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不要奢望改革会“一帆风顺”，不要空想有一种“毫无流弊的改革法”，改革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和完善。鲁迅先生这些话，对于正在全面推进改革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多么亲切！鲁迅在文学上的革新，在文化其他方面所从事的全部改革实践活动，都证明：他与

那些孜孜以求个人不朽的文人学士不是一路，他追求的是社会的革新，人类的进步；他与那些飘飘然的幻想家不同，他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科学理性，具体研究改革的规律和办法；他与那些只说不做的清谈家划清了界限，他不仅热烈地倡导改革，而且脚踏实地地参加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个称号，对于鲁迅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鉴古取今，融合中外，“拿来主义”，“别立新宗”的文化思想。前面说到，鲁迅所处的是一个古今文化转折、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中，既有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也有封建复古主义的逆流；既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也有盲目排外的。其共同病因，就在于对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缺乏科学分析，存在盲目性和迷信。而鲁迅则不同，在他的文化思想中贯穿了融合和开放的观念。他在早年就提出：“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思想。后来，则进一步提出了“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大家所熟悉的《拿来主义》等文更是把这种拿来、融合、创新的思想系统化了。他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的响亮口号；所表达的“采用外国的良规”，“择取中国的遗产”，创造新文化的思想；对于古代和外国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对待的态度；对于中外文化遗产，“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加以融合的方法，等等，对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很有启发和教益的。

当然，鲁迅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宝库，还有待于我们更多地深入挖掘和研究。

鲁迅研究，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为进步文化界所重视。六十多

年来，对鲁迅精神和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成绩很大，但是，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右的和“左”的偏向都发生过，尤其是十年动乱中极左路线使部分人发生了严重片面性、简单化的倾向，甚至随意曲解鲁迅，当作整人的工具。研究、宣传上的偏向和错误，使部分青年看不到鲁迅的本来面貌，不懂得他的真正伟大之处了。在纠正了极左路线后，又发生了冷落鲁迅、轻视鲁迅文化遗产甚至贬损鲁迅的现象。这也是一种错误。当然，学术研究和其他一切事业一样，错误总是会有，不必惊怪和慌乱。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百家争鸣，坚持充分说理的论争，就能够防止大的偏差，保持正确的方向。

总的说来，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开辟了新局面，成果是可喜的。可是，考虑到对鲁迅的研究、认识、学习与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有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对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应该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高屋建瓴的分析和综合，应该出有高度科学性的新成果。

我很赞成“思想要活跃，学风要严谨”这个说法，我以为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和风格。鉴于过去的教训，在鲁迅研究中，我感到有几个问题特别应该予以重视：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鲁迅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他的作品、思想、道路作周密的考察，取得正确的认识，而不是只把他的名字、他的只言片语当作题目，随意地描绘成各自需要的样子。要避免和克服实用主义的不良影响。二是要把鲁迅研究同现时代结合起来，用以指导和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为研究而研究。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文化思想，鲁迅一生所致力于创造的中国新文化，同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息息相通的。三是要不断探索和提高。在鲁迅研究上也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不断地开拓鲁迅研究的新领域，

提高鲁迅研究的水平。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以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就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和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和繁荣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为此，我们必须培养一支宏大的文化队伍，“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这支队伍的战士应该牢记鲁迅的那句名言：“从水管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切实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大力培养和提携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要遵循宪法的原则，切实保障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提倡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和争鸣，各种不同流派之间的自由竞争。然而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意气用事和不利于团结的现象。党中央提出要创造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环境，形成相互理解、信任、尊重、支持的气氛。六中全会又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所有这些，都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努力。鲁迅是中国“五四”新文化的拓荒者和创造者，我们这一代应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开拓者和创造者。我相信，我省的鲁迅研究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会继承鲁迅的革命文化传统，发扬鲁迅开拓创新的精神，为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鲁迅小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学的影响

吴 奔 星

大概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一年前后，随着一批写所谓“难懂”的诗（有人称之为“朦胧诗”）的青年诗人的崛起，文艺界展开过能否抛弃文学传统，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使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提起是由于我国正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的文学，自然也该现代化。那次讨论的焦点是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要不要抛弃中国文学的两个传统：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传统，就是说，文学现代化与文学民族化的关系是统一的呢，还是对立的？是互相渗透的，还是彼此分割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民族化会不会妨碍文学的现代化？如果文学的民族化妨碍文学的现代化，那就不仅悠久的古代文学传统应该抛弃，连“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传统也应该抛弃。这样一来，不仅“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能否称为现代文学，要重新考虑；连鲁迅能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要重新评定。看来，问题的性质是严峻的。现在就鲁迅所开拓的中国现代文学，能否称为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且使回答有些说服力，首先得谈谈什么叫做文学的现代化？该怎样理解新文学的现代化？鲁迅的小说算不算现代化的小说。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为什么称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的问题，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进程就 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如果正视新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应该是从“五四”前夕倡导“文学革命”之时开始的。当时的先驱者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过程，就是从文学的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所谓“文学革命”运动，实质就是文学现代化运动。鲁迅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仅在于他第一次把反对封建思想的内容和白话文学的形式结合起来，写出了第一篇划时期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他首先借鉴西方文学，创造了第一批现代化的新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他的白话小说出色地奠定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基础。某些同志因为偶尔发现在《狂人日记》之前已有白话小说，就说《狂人日记》并不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完全无视新文学的本质意义在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个关键问题，只看到白话这一点，是不值一辩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白话”古已有之，并不是小说现代化的标志。

当前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学艺术也必须现代化，这是切合时宜之论，是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形势与任务相适应的。但是，他们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只有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才能完成，才能称为现代化。而传统文学则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负荷，必须抛弃，才能轻装前进。他们忘记了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似乎不认识或者忘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者们，就已广泛地向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借鉴文学的形式与技巧，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鲁迅等先驱们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现代文学。这是一个不应忘记的光荣传统。如果忘记了。就不

仅割断了历史，还会给人以错觉：认为从“五四”发展到今天的新文学，还不能称为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亦步亦趋，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学，才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协调。这个错觉如果不加以澄清，势必抹杀或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一直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业绩与光辉传统。我们应该首先肯定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者们所致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现代化”的运动。他们在“五四”前后，向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西方文艺思潮、流派借鉴文学形式与艺术技巧。使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旧文学，转变为现代化的新文学——人的文学乃至人民的文学，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但是，必须指出：他们当时借鉴西方文学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他们虽然也吸取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可取之处，但并不把它作为主流。因为现代主义文学只是十九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的众多的唯心主义文学思潮、流派之一，它在揭露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以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样，起过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并刷新了某些表现形式与艺术技巧，曾给西方文学带来有益的影响。但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主流，始终是早已存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尔基称它们为西方文学思潮的两大主流。在我国的“五四”时代，虽然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而促使中国文学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还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股文学思潮占着领先的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不容否认的事实。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者们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只起旁敲侧击的陪衬作用。在诗歌现代化的过程中，李金发首先接受现代主义中的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并在周作人的协助下，出版过三部诗集，算是引进了象征派诗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时李金发等写的一些象征派诗，其“朦胧”神秘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初期崛起的所谓“朦胧诗”。但八十年代写难懂的朦胧诗的青年，并没有或

很少有直接受过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不能把他们与李金发等人等量同观。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诗，朱自清曾经指出他们的缺点，也曾肯定他们的成绩，仍然认为他们是新文学运动头十年新诗的三大流派之一，即象征诗派、与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鼎足而立，表明它们在新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到三十年代初期与中期，又有一批诗人如戴望舒、路易士、施蛰存等，吸取象征派的某些技巧，扬弃它的一些缺点，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使象征诗派逐步转向，把从“五四”崛起的新诗中的自由诗推向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新阶段。因为他们的诗最初多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的《现代》文学月刊上，就被称为《现代》派，其实，那只不过是那些为《现代》月刊写诗的诗人群，与西方的“现代派”并非一回事。后来有些人往往把他们混为一谈，实在是历史的误会。《现代》派诗人很复杂，从诗风看，他们都是自由诗派，只是比二十年代的自由诗派进了一步，更“现代化”一些。包括李金发的象征诗派在内，三十年代以《现代》月刊为代表的自由诗派，并不否定诗歌的民族传统，他们倡导新诗现代化。是和民族化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这一点应该作为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新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和民族化相对立的，相反，二者是渗透的。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只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文学，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别林斯基说：“越是普遍的作品，就越是民族的，独创的。”^①因此，只有把文学的现代化与文学的民族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的新文学才能具备鲜明的独特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正是坚持了这一点，开拓了一代新的文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

鲁迅小说在观念上、理论上的现代化

“五四”前后崛起的新文学，由于坚决反封建士大夫文学，积极借鉴西方文学，从而在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使新兴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而鲁迅，则是首先从小说入手，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光辉代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卓越奠基人，他的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早使中国小说从观念上、理论上（包括内容、形式、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环境描写、表现技巧、文学语言，乃至创作方法等）都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革新与革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的特色，以其鲜明的现代意识，区别于传统的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出笼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把现代化的新小说推上新文坛，揭开了中国文学划时代的新篇章。

认真介绍西方文学，吸取营养，创作多体裁、多风格的新文学作品，鲁迅是成绩斐然的光辉典范。早在一九〇七年，他就称赞俄国的果戈里“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他后来翻译其讽刺小说《死魂灵》的动机实蕴蓄于当时。他从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前夕创作的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译述）、《怀旧》以及白话小说、白话诗、随感录等等，无不打上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深刻烙印。然而，他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独具匠心的创作。他是使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先进经验，融会贯通，从而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小说的第一人。仅就《呐喊》这部前期小说集说，就具有区别于一切传统小说的现代化特色。

鲁迅前期小说的“现代化”，首先表现在他对小说的传统观念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要求彻底变革的创新意识。中国的读者向来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议，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闲、消遣之作。用以消

愁解闷，打发岁月，即使称之为文学，也是左道旁门，不是正经文学，被排斥于文学正宗之外。对此，鲁迅曾多次加以批判。中国的古代文学，散文有流派、诗词有流派、戏剧有流派，唯独小说没有流派，小说是不入流的消遣品。这种由来已久的歧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梁启超在清末曾写《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等论文，企图加以纠正，但直到“五四”前夕爆发的文学革命，才发生根本变化。在“文学革命”的呐喊时期，鲁迅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不止一次地公开声称：明清以来的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说和历代相传的白话诗歌与谣谚，都是文学的正宗。这在文学观念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破旧立新”的大革命。而鲁迅正是当小说的传统观念彻底革新的时候，借鉴了百来篇外国小说，首先从事白话小说的创作的。从一九二〇年以后，他在北京各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也是第一次把小说视为文学正宗而搬上大学的讲坛的革命行动，是深为当时卫道的复古派们所嫉恨的。

其次，在承认传统的白话小说、诗歌、谣谚为“文学正宗”的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先驱者，因接受西方进化论、泛神论、人道主义思想，从而在文学理论上，进行思考，一致认为古人已造古人的文学，今人当造今人的文学，每一个时代都应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新文学向旧文学挑战，吹响革命的号角，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周作人、郭沫若等在文学理论上，提倡人的文学，鼓吹个性解放，表现自我意识，反映到创作实践上，就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体与创作的中心，把人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叶圣陶最早提出“生活是诗的源泉”，鲁迅则进一步把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作为创作的动机与目的。他在1902——1903年就开始探索中国人民的国民性，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国民性的改造。他之所以写小说，